

□ 吴园一

中国经济开放度选择及指标体系

自然界的进化和社会的演进都揭示这样一个规律：一个有限“系统”如果与周围环境失去联系，没有物质交流，其能量虽然守恒，但其能量的“质”或“效用”将逐渐劣化，“质”劣化在封闭环境下具有不可逆性，最终系统会趋于沉寂（热力学熵增原理）；而有限系统与周围环境的无序交流或联系失控，又会导致系统能量发散，能量向外无偿散失、耗损和渗漏同样会使系统趋于沉寂。将一个国家的主权环境比作一个有限系统，若一国经济关闭自守或长期开放不足，即使初始经济繁荣也会趋于衰减；而一国如果开放无度，不比较开放代价，不考虑开放方式，不研究开放结构和开放时机，则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不但难以提高国际经济参与力、竞争力，难以扩大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而且还会过多失去其国内市场的份额，结果国内资源对外渗漏，产业结构失调，民族工业萎缩，国际债务负荷过量，经济趋于衰弱，国内通货膨胀，甚至引发金融、经济危机。近年来开放无度的教训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泰国等国家都曾经发生过。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特定的前提下展开的，要在这一特定的初始条件下获得成功，积极、合理、有效的开放度选择是实现开放中的低代价高收益的必要条件。应该避免为开放而开放，进入无“质量”要求仅追求开放幅度的开放误区。为此，从理论上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开放度指标有其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开放度”内涵

“度”表示“质”的临界点，“开放度”内涵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从经济上：一国的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为保持“质”的稳定和“量”的平衡与别国相互渗透的数量界限和结构要求；二是从社会角度：舶来文明的吸收度要大于舶来糟粕对民族美德的扭曲度，舶来文化对国内传统文化的冲击力要控制在社会稳定所能承受的范围；三是从环境上：因开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所失或为治理所费应小于开放利益所得。三个方面存在着内在联系，本文仅将经济开放度作为研究对象。经济“开放度”的内涵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本国经济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何种代价进入世界；二是允许别国经济渗透本国经济的方式和程度。

“经济封闭”是指一国仅依赖国内资源、人才、技术、市场，其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方式与外界隔绝。“经济开放”是指一国的技术、人才、资源和市场几乎完全依赖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适度开放”是介于封闭和完全开放的两个极点之间，一国人才、技术、资源、市场等既依靠国内又借助于国外，有利于先进技术引入，有利于现代化管理水平提高，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优化。

“度”到底多大为好,一个较为简单的判据是:国内全社会总产品价值利用国际市场实现的程度越高、开放代价越低,则越接近“最适度”点。“最适度”点就是“实现程度”最高与开放代价最低的两维交点。

二、“适度”开放与西方经济理论

“适度”其“质”的要求是国内经济是否进入良性循环;其“结构”的含义是国内经济各层面是否协调,产业结构是否趋于优化;其“量”的含义是“开放度”与GDP是否动态协调。这里借助于七个“是否有利于”指标来进行衡量:

- (1)是否有利于国内全社会再生产更加协调;
- (2)是否有利于本国在国际交换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 (3)是否有利于本国从全球范围内获取先进技术、设备、资源、资本等;
- (4)是否有利于国内民族企业生存和发展;
- (5)是否有利于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清偿能力,改善国际债务结构;
- (6)是否有利于本币走向国际、汇率平衡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
- (7)是否有利于出国人才的回流,国内人才质量和数量的提高,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

“适度”概念主要是针对从经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市场经济是强者经济,发展中国家作为刚进入比赛场的弱者需要保护。由于国情不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对保护不感兴趣。强调完全开放是基于这些忽视条件的理论基础上:(1)国际分工有助于世界资源充分和深度利用,有助于物尽其用和提高资源的产出投入比;(2)任何一国都越来越不可能拥有世界全部的先进产品和技术手段。国际分工协作也越来越重要,经济开放有助于国际间的分工协作,有助于产品的更新换代,有助于为人类创造更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3)开放有助于熨平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有助于区域资源互补,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加速整合;(4)经济开放和国际协作有助于实现商品的低成本流通,互换各国都能从中得到比较利益;(5)不同自然禀赋的区域借助于开放,易于越过主权壁垒,促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6)还有近年来颇有影响的“后起国优势说”、“雁行理论”、“产品循环说”。

为什么西方的这些理论没有“适度”概念?既然开放结果如此完美,“适度开放”还有立足之地吗?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结果曾出现与西方开放理论相左的教训。比如墨西哥近十几年两次遭受金融危机的厄运,危机不仅给墨西哥而且给世界经济都罩上了一层阴影。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开放的结果,然而另一个事实是贫富两极更加分化。看来,从全球范围内实现一部分社会总产品还只是开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的无条件开放理论与其特定的地位有关,即经济相对强盛和国际竞争力相对完备。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地位先天不公平,其竞争力和开放条件先天不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达国家设置下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恶化的贸易条件下,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要求快速发展经济的迫切性,往往强加种种不切实际的开放要求(比如美国在对待中国复关条件上就有非常苛刻的要求),使发展中国家本来就虚弱的国内经济过多地暴露在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漩涡中。发展中国家既然还不具备西方开放理论隐含要求的条件,为什么要受西方经济理论“开放幻觉”的误导?将开放利益绝对化、对称化和理想化?既然西方经济学开放理论根植于强盛经济条件上,为什么不重视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适度开放和开放手段呢?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应做到

“放”而有“度”，开放既要考虑“量”的空间，更要重视“质”的平衡，把握和选择好适应本国特定时期条件下的开放质量、开放结构和开放方式。近两年，中国政府收回了一些不必要的对外优惠政策，这是非常明智的适度开放措施（1996年4月1日取消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减免税，1997年三资企业在出口退税上落实国民待遇与国有外贸企业一视同仁，统一出口退税率“征17退9”）。

所谓“开放代价”即让出部分经济主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闭关自守、游离于国际经济之外是不现实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达国家开放收益大于开放代价同样的结果，必须通过条件创新改变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合理部分；必须利用开放手段创新把握好经济开放度；必须协调好国内微观主体与宏观经济的开放利益。尤应重视经济强国与弱国开放条件的不对称，将提高开放质量和开放结构作为衡量发展中国家经济开放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三、开放度制约因素

实施“最适度”开放政策是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开放条件的不对称，与这些条件相关的五个因素是：

1. 国内市场的容量和结构

“开放”处于两个不同方向的制约力之下：市场经济要求的改革和体制转轨动力；市场容量、市场结构限定的约束力。当开放到达一定程度时，国内市场容量、市场结构、产业结构等约束力作用越来越明显，“大胆开放”应注意向“适度”平滑过渡。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国内政局稳定、经济稳定就不需要有“度”的限制，就要加大开放度，外资越多越好，以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压力和激动力。其实不然，不管是经济关系还是经济过程都并非这么简单，并非为开放而开放。开放利益有长、短期之分；开放的负面效应也有长、短期之别。如果在短期利益后面隐藏着后期的长期负面效应，就不要被表面利益所惑。对外资筛选的目的是要把“夕阳工业”和转稼污染的工业坚决拒之于国门之外，要把会冲击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游资拒之门外，要限制有损国内民族工业，以占领、垄断我国市场为主要目的的外资。中国对外开放是为了从开放中获得利益且是长期的利益，为了保持国内经济长期稳定，避免国内发生过量的摩擦性失业，开放就要适应国内产业结构和市场容量，就要切合国内再生产的实际要求，为此，就不应该存在经济开放度越大越好的幻觉。开放过度与开放不足一样都会影响我国开放战略目标的实现。

2. 国内再生产的协调

国内再生产协调分几个层面：两大部类比例的协调；各部类内部比例的协调；行业内部的比例协调；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协调；等等。利用国际生产要素和国际市场来实现国内总产品，关键是把握好开放度，注意本国要素与别国要素的互换方式，把握好商品互换中使用价值形态、实物形态的均衡，把握好开放程序、开放时机和开放方式，注意国际市场需求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把握好本国再生产过程中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同步性。要防止脱离本国国情，不加筛选引进外资，国内各公司盲目出口竞相削价，盲目进口，导致国内再生产结构失调的失控性开放。

3. 国内经济增长方式

一国经济增长是否有序，是可持续增长还是短期性高速增长，是急功近利式还是远期战略型，都与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有关。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了该国的对外开放方式。日本在1954年至1980年期间，引进电气机械技术远高于其它类商品高达4335件，是与其选择的经

经济增长方式有关。超越本国经济承受力的开放度等于将本国市场完全无保护地裸露于国际经济的漩涡中。在收益与风险不对应下,国际通胀很易找到机会向国内转嫁。由于难以实施独立的国内经济政策,国内市场很易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开放无序及过度到了一定时候,必定会出现国内经济剧烈振荡、恶性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

目前国际市场是投机甚于投资,而中国的国内市场规则还不够完备且较脆弱,政府实施监管的压力还很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大部分出口商品附加值还较低,非价格竞争能力相对弱,而价格竞争受到一定的限制(即资源、通胀和国际反倾销);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由于产业结构老化,其商品的结构单一,出口商品的国外需求价格弹性低、需求价格弹性高,国内的供给价格弹性低;进口商品的国内需求价格弹性低、需求收入弹性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贸易依存度提高过快,经常性项目逆差往往依靠资本性项目顺差弥补;在经济速度过快得到有效控制时因贸易依存度过高而难以压缩进口。这就是当西方经济萧条时中国的出口量减幅与收汇量减幅之比小于1、在西方经济复苏时中国的出口量增幅与收汇量增幅之比大于1的主要原因。以此作为中国开放的初始、边界条件,中国要保证物质、信息、能量与国际的有序、有益交换,防止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实现开放的高收益、低代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求,就必须制订适宜的经济、外贸、外汇政策,制定适度的开放度。

4. 民族工业承受能力

民族工业与舶来工业既有矛盾又相辅相成,我们不能一概排斥舶来工业,又必须兼顾民族工业的承受能力,关键要把握好承受时间。中国对外开放和适度保护(民族工业)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为此,要根据本国民族工业实际现状确定保护条件、保护时间、保护政策、保护方式等可操作的“保护度”。处理好这对矛盾是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保护过度或保护实施时间过长是开放不足,将导致国内民族工业长期处于“卖方市场”地位,缺乏技术进步和效率的内在激励动力,失去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锤炼机会。民族工业没有风险就没有发展机遇,保护终究不能永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门终究难以长期关闭,到时落后者仍难免淘汰;二是无条件开放或没有保护时间,将还处于幼稚的民族工业抛入充满漩涡的波涛汹涌的国际经济市场,不但幼稚的民族工业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而且本国经济主权也将被别国左右。

5. 国内的资金容量

中国的金融市场经改革和发育,资本容量已初具规模,国内储蓄率已达40%左右,市场清偿能力大大提高。证券市场的不断成熟使二级市场十分活跃,投融资渠道十分流畅。在国内资本市场的筹资潜力进一步提高的同时,国际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也达1600亿美元。在此前提下应从吸引的数量型转入质量型。应注意外资与内资的替代性、内资与外资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

确立开放质量和改革效率的价值取向,就应该按照本国和国际情况,根据中国阶段性发展的目标要求,动态选择好“开放度”,这是衡量开放行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开放度模型的构想

设置开放度模型是为了量化比较。这就决定它不是绝对指标而是相对指标,通过本国的纵向比较,本国与别国的横向比较,试图寻找一些规律。在以上分析基础上笔者构筑模型仅涉及七个指标:

Y——经济开放度(无量纲);

- F——出口总额；
 GNP——国民生产总值；
 P——出口商品的制成品总额；
 C——实际利用外资额，这一指标区别于协议利用外资额；
 T——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D——引入外资中的直接投资额；
 R——国内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之比。

模型为：

$$Y = \alpha \times F/GNP + \beta \times P/F + \gamma \times C/T + \eta \times D/C + \xi R$$

式中(F/GNP)为出口依存度，指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这一指标主要用来反映一国产品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和依赖程度；(P/F)制成品依存度，指一国的出口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值以直接反映出口结构和该国产业结构及产品的竞争力、占有率；(C/T)利用外资投资率，这一指标反映国内投资额中外资占有的比率，以反映外资参与我国社会再生产的程度；(D/C)指实际到位外资占协议外资比率，以反映一国引资的政策效果。

式中 α 、 β 、 γ 、 η 、 ξ 为各要素对应权重且 $\alpha + \beta + \gamma + \eta + \xi = 1$ 。^① $\alpha/\beta/(\gamma + \eta) = 1/2/4$ ，因考虑中国目前制成品还只占商品出口总额的70%左右，直接投资占利用外资的60%左右，以及模型要求的普适性要求，将各权重设计为：

$$\alpha = 0.10, \beta = 0.35, \gamma = 0.20, \eta = 0.15, \xi = 0.20$$

经济开放度模型的数学微分可得到经济开放度函数式。以国别分类将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对比可显示各国经济开放度量上的差别；以年作为阶段将数据代入模型可进行纵向比较，观察发展趋势和变化特点；以中国各省分类将数据代入模型后可比较中国各省经济开放度的差别。依笔者管见，将模型得出的经济开放度数值逐一比较，再结合宏观经济，也许可评判出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制定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开放度弹性区，为政府开放决策提供参考（“度”量化后的具体分析，笔者将另辟专论）。近年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从改革初的8%到1987年27.4%，超过了世界大国组27.9%的平均水平，随后1992年为38%，1993年为40%，到了1994年已达47%，变化增量已大于中国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理论值水平。

注：

①参见解念慈、魏宁：《浅论对外开放度及其定量评价》，《国际贸易》，1988年第10期，第31页。

（作者单位：无锡轻工大学经贸系；邮编：214036）